

## ※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※

# 永遠的懷念—— 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

曾志雄\*

### 一、永恆的記憶

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七日，是香港中文大學「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舉行的第二天。當天中午，大會工作人員告訴我，他們遺失了我提交的論文正本，因此我必須在下午補寄有關論文給大會，好讓他們印製副本，以便明天在大會現場補發。下午，我回到辦公室，除了翻檢電腦檔案找出論文之外，還要趕時間製作宣讀論文用的簡報。

我第二天報告的題目是〈〈周頌〉的年代〉，是《詩經》的一個老問題。不過，我這次採用了較新的語言證據表達我的看法。由於〈周頌〉一共三十一篇，篇數不少，在語言證據論證的手續上，必須檢查每篇作品的語言特點，所以論文篇幅相對地長。考慮到論文報告的時間每人只有二十五分鐘，我一直謹慎地提醒自己，簡報一定要控制好時間。很奇怪，從建立簡報格式的一剎那開始，我腦海中就盤旋著一個特別的問題：要不要把〈周頌〉中的「而」字放在簡報裏頭報告？〈周頌〉只有一個「而」字，就是〈小毖〉的「予其懲而毖後患」。這個字雖然歷代有不同的解釋，例如朱熹就認為它是個連接詞，但在清代大家段玉裁、胡承珙、馬瑞辰等人的充分討論下，已經確定這是個形容詞詞綴而非連接詞，相當於今天漢語的「的」。這個「而」字在用作詞綴時，對判別時代的作用並沒有它在用作連接詞時那麼明顯。在簡報中，照道理我可以完全不提這個字。不知道甚麼原因，我內心總是纏繞著要不要把這個字納入簡報，向觀眾報告。直到三小時後簡報完成時，這種

---

\* 曾志雄，香港城市大學中文、翻譯及語言學系兼任講師。

思緒還沒停止；到晚上入睡，同樣的問題仍然盤據腦海，而且何定生老師在我心中的片段，開始一幕又一幕地浮現，無法遏止。這時候，我知道，何老師在我內心已凝固成永恆的記憶了。在論文裏頭，「而」這個字雖然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虛字，但在我構思簡報的過程中，它卻是一種複雜的情意。在簡報篇幅的層面上，要不要把「而」字納入簡報只是簡單的裁斷；在心理動機上，卻變成要不要把「而」字跟何老師的因緣向聽眾交代的掙扎。

自從一九七〇年在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》看到何老師一九二八年發表的〈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〉一文之後，它給我的震撼非常大：一來，它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篇古代專書語法的論文，這時我正開始著迷於古漢語語法；二來，該文思路清楚，又充分運用統計數字論證，結論明確；三來，全文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完成，在我看來，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；四來，全文對連詞「而」字分析所得到的時代特徵非常鮮明，文中「『而』是東周以後字，盛于春秋戰國，用此字者，決非西周時代」幾句的論斷，直接明快，就像老吏斷獄，毫不含糊。這幾句話足以代表了何老師說話和為文的風格。當時何老師只不過是大大一新生，學術界古漢語語法研究尚未開風氣，《尚書》又是一本深邃古奧的典籍，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難題，何況他那時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；何老師就在顧頡剛的幾輪通信鼓勵之下，竟然在出奇短的時間內，做出這樣超凡的文章，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見！我雖然不曾知道顧、何二人交往的任何具體細節，但從這篇文章和二人在《週刊》裏頭前後的通信看到，何老師對顧頡剛的愛慕是傾倒的，顧頡剛對這位門人的感悟是徹底的。

「而」字連詞的時代特徵，在我人生中邂逅不只一次。在一九九〇年我寫《侯馬盟書》博士論文的時候，研究的材料裏頭又有大量用作連詞的「而」字。《侯馬盟書》是一九六五年在山西省侯馬市出土的手寫書體文物，到一九七六年才有全面的考古報告。考古報告出版的時候，離開何老師寫〈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〉快半個世紀了，但盟書上無論文字字形、人名、事件，或伴隨出土的其他文物，無一不指證這是春秋後期晉國的東西（相當於孔子的年代）。裏頭「而」字的古文字和古語法的時代特徵屬於春秋後期，都是今天學者所確認。何老師「『而』是東周以後字，盛于春秋戰國」的論斷，竟然得到出土古文字實物有力證實，誰也料想不到。到最近，我對《詩經》各篇的斷代產生興趣，這個連詞「而」在《詩經》中也是一個非常矚目的語言成分，它除了在〈周頌〉出現一次之外，在其他的〈風〉、

〈雅〉、〈頌〉各篇裏頭，幾乎無處不在，無疑成為《詩經》斷代的一把重要標尺。每一次看到這個「而」字，就像向我提起了何老師。

也許是我個人出自對何老師的敬佩，加深了我對「而」字的認識和注意；也正是這個古今常用而不為人注意的「而」字，它凝固了我對何老師的懷念之情，至今不變。

## 二、鮮明的印象

在我印象中，何老師在臺大好像不為人知。我在臺大唸書的頭二年裏頭，從來沒聽人提過何老師。我第一次認識何老師，是在大三選修《詩經》專書。第一次上課，就在當時的普通教室二樓西邊角落的一間教室。我記得當天上課，學生非常踴躍，有同班旁聽的同學，也有高班和低班旁聽的同學，聽說還有幾位已經畢業，甚至也有從國外拿了碩士學位回來聽課的學長。我一進教室，濟濟一堂，感覺就像一個小型的校友會聚會。我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。

何老師出現的時候，大家非常靜默地注視他。他個子不高、身材癯瘦、眼睛有神、神情肅穆、憂鬱而不帶一絲笑容，修長的臉龐，上寬下尖，頭髮稀疏而梳理得光亮，一看就知道是個注意細節而喜歡深思的人；最令人難忘的是嘴旁兩條深刻的直紋。講課時，咬字吐音時而高，時而低，就像在唱歌一樣，迭宕有致，然而高音和低音音域相差特別大；他的高音部分，明顯比一般人更高，因此他那帶京腔的國語也顯得特別好聽。他說話不徐不疾，配上高亢的發音，聽了之後令人印象深刻。教書的時候，一面唸詩句，一面在木板的講臺上來回深沉踱步。腳上烏黑發亮的尖頭黑皮鞋，在講臺上一下一下敲得「叩叩」作響，十分有節奏。臉上的直紋時而拉長，眼光時而凝視學生，時而貫注地下，隨著授課內容而變化，就像一個詩人在那裏沉吟歎息，聽者這時仿佛看到了原作者在吟唱。雖然講的是一些平常道理，聽起來總覺得他在表演。他的一舉一動牽引住每個人的視線、呼吸和動作。我這時才明白到為甚麼這麼多人來聽課的原因。我覺得，他裏裏外外根本不同於系裏的其他老師，裝扮、用詞既西化，又不含蓄。

何老師上課要言不煩，善於抓住機會發揮，說話時表情也特別豐富，讓人印象深刻。比如說，《詩經》多次出現的「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」，是很普通而淺白的詩句，不容易再用言語加以解釋；可是到了何老師的口裏，就演繹成：「同學們

吶！這就是女人的哲學呀！她們一走就再沒機會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呀！」說的時候，語調特別深沉，節奏特別緩慢，兩邊的嘴紋特別拉長，本來鬆垂的眼皮也顯得特別下垂，同時一臉黯然、哀傷、無奈，踱步的節奏也跟著放緩放輕。古人說「一唱三歎」，這是最好的寫照。我想，這樣的聲情演繹，雖然話語不多，相信不但女生聽了深有所感動，男生聽了，也能即時明白到古代婦女的亙古悲哀。《詩經》中這句話前後一共出現了四次之多（《詩經》相同句子重複次數達到四次的並不多），聽了這樣的演繹，不難理解原句的感情，不難理解這句話為甚麼出現那麼多次。

剛開學的時候，大家都聽說何老師正在生病住院。他第一次上課是從醫院請假出來，可是大家看到他只覺得身體瘦了一點，卻全不覺得他有甚麼病似的。後來才知道他患的是癌症，不能每週都來上課。他不來上課的時候，起初由我到老師家裏把錄音機、錄音帶帶到教室放給同學們聽，錄音都是提早一兩天錄好。後來老師身體越來越差，師母照料的時間多了，就來不及預先錄音，最後由我在上課前一天到醫院幫何老師拿著《詩經》本子錄音，再把錄音帶帶到教室播放。在醫院裏看到何老師，已經跟之前不大一樣了，他躺在床上好像不能多動，都是閉著眼睛不說話。不過，錄音還是應付得來。他錄音的時候不太睜開眼睛，也不翻看甚麼注釋，只看看〈目錄〉要講哪一篇，便開口隨唸隨講，十分輕易。有時候，老師身體好一點，他會打開眼睛說說話，問問上課的情況；有時候也隨口唱幾句西方藝術歌曲自娛，還得意的介紹歌曲，說這是他在燕京大學跟一個意大利女聲樂老師學的。他說，他習唱的是高音，可以唱到 B# 調。這時，我才明白何老師授課的聲音裏頭，原來含有聲樂成分。

由於我選了何老師的《詩經》，所以系裏把何老師安排做我的導師。這一年，同班大約還有七八個同學做了何老師的導生。上學期結束之後，何老師約導生到他家裏見面，那大概是一九七〇年一個潮濕春天的下午。那天新生南路、溫州街一帶下著毛毛細雨。有好幾個同學遲到，老師只坐在客廳裏不說話。等到大家到齊的時候，老師才開腔：「你們知道啊，現代人的精神是要守時。外國人都說中國人沒有時間觀念，看不起我們。」停頓一會之後，就談論讀書的事，鼓勵大家多讀書；他又提到做學生的他常常到顧頡剛家裏，顧家藏書很多，各種各類都有，外文書也不少，顧先生很愛學生等等。可是說話不多，有時候欲言又止似的。

何老師喜歡音樂和語言學，他曾經跟趙元任學過語言學。一九六七年趙元任回

臺灣，在臺灣大學演講，何老師說他去見過趙先生，向他請教語言學問題，還特別為趙先生即興唱了幾首高音的歌曲。老師雖然以現代觀點和方法研究《詩經》，他告訴我，他讀《詩經》的時候很重視訓詁工作。他推崇馬瑞辰，自己也為了追求解讀準確，把《詩經》很多字都按字做了卡片，考察《詩經》的字義。老師去世後不久，整理《定生論學集》的時候，我在他家裏也真的發現了部分手寫卡片，每張大約是三吋長正方形的薄紙片。在他較早的一篇論文〈孔子言學篇〉裏頭，就可以看到他對「學」字各種含義的細緻分析，其實都是出自這種文字考察的苦工夫。

有一次，我到老師家裏拿錄音機，看到老師書桌上有些發黃的散張英語漫畫。據師母介紹，這是因為當時大學教授的待遇不高，為了讓家人過得好一點，老師就在課餘把英語漫畫中的對白改譯成中文，供報館使用，賺些外快。在當年臺大中文系的老師之中，大概何老師的英語程度是不錯的。當年老師患癌症，家裏人都瞞著不敢跟他說。有一天晚上，當家人從醫院料理完回家之後，何老師看到藥包上的藥名，查了一下英語詞典，竟然被他查出自己的病情。當時老師很不高興，就在深夜，頂著嚴寒和醫院的反對，還沒穿好衣服，自己叫了一部計程車回家。待在家裏之後，有好幾天都不願意回醫院去。到了三月的時候，天氣溫暖，老師似乎常常回家。我住在臺大僑生第十一宿舍，跟老師家隔著新生南路遙遙相對，我看到老師在家的日子，幾乎每天早上都和家人從溫州街走到臺大操場去散步，似乎很珍惜和家人的相聚。每次他身披絨大衣，沿著新生南路走，從當時農推館旁邊的側門進入臺大校園，大約早上七點十分左右，我從操場跑完步回去宿舍的途中，都會看到老師和家人散步經過；除了師母之外，也總有女兒或兒子陪行。有時互相的距離近了，他總是拄著手杖停下來，對著我笑笑。

何老師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說話的聲音、話語的簡短和臉上的表情。

### 三、單打的網球手

跟何老師聊天的日子雖然不長，但從他口裏知道，顧頡剛對他非常喜愛。他在廣州中山大學本來唸新聞系，由於文筆好，成了系報主筆。顧頡剛到了中山大學之後，出於對顧氏仰慕之情，他毅然申請轉系，追隨這位心儀的學者，然而卻受到系方的反對和阻撓。第二年，由於廣東學潮等等原因，顧頡剛要回北方去，就把這個打算轉系的學生也帶到北京。

在北京，老師就學於燕京大學。據他說，這是一間美式大學，很注重體育活動。每天下午四點鐘，校園就會響起航海鐘，全校學生馬上停止學習，紛紛從宿舍、圖書館出來，換上全白的運動服，到操場運動。他愛打網球，曾經跟外國教練學習。不過，他只喜歡一個人打，不願意跟別人合作雙打。這點教練後來也注意到，經常勸他練習雙打，培養合作性，以免個人的性格變得孤僻。可是老師始終都沒辦法改變單打的習慣，也許就養成了他孤獨的性格，這點從他提起時的神情看，老師似乎是自覺到的。我在臺大唸書，也真的覺得老師之間很少人提到何老師，跟何老師聊天，他也很少談到別的老師。

在燕京大學，何老師跟何炳棣先生同一寢室。老師說，何炳棣精熟西洋史，他自己則鍾情於中國歷史。他們二人每夜到了熄燈時間，還不甘心就寢，常常躺在床上互相以中外歷史切磋論難，試圖以壓倒對方為樂。說時，臉上、嘴旁還流露著相信是當年的那種得意的歡娛。

何老師研究《詩經》從古字義和古代禮樂制度出發，注重探求《詩經》的原始面貌和時代意義，以此填補古史辨派對《詩經》研究的不足，這是一般人不易為之的事。由於他親身經歷古史辨派的洗禮，對當時《詩經》研究的情況瞭如指掌，所以晚年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。他在世的最後幾年，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《詩經今論》，該書一方面挖掘過去「疑古派」在討論《詩經》上的不足，特別著力於〈雅〉、〈頌〉禮儀意義的探討；一方面也深入而有系統地闡述了漢人對待《詩經》的態度，以及這種態度對後人的影響。書中對《詩經》問題前後照應，可以說繼往開來；在評述學者觀點時深入淺出，尤見識力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。文章中看問題之準，找證據之精，更往往叫人歎為觀止。他對自己的《詩經》專題研究表現深具信心。他曾經自豪地對我說了不只一次：（二十世紀）三十年代是《詩經》的 Koo's Age（顧頡剛時代），現在是《詩經》的 Ho's Age（何定生時代）。

除此之外，他也很重視鄭玄，尤其是鄭玄的《詩譜》。雖然他並不完全同意鄭玄在《詩譜》中的世代觀，但他認為《詩譜》是重要的著作。《詩經》課下學期的期末論文，老師給我們的題目就是「詩經世代問題」。在出題以後，老師還親自說明，要大家細心參考《詩譜》的內容。雖然當時我的論文對這論題寫得不太恰當，但畢竟它成了我經常注意的一個目標。現在，我竟然在寫作本文之前完成了全部《詩經》作品的斷代，或多或少可以說是這個題目所產生的推動力量。

## 四、深情的盼望

一九七〇年四、五月，大概是我認識何老師以來他身體最好的時候。那時何老師大部分時間都能夠到教室上課，從他上課的表情少了變化看，他的心情應該平穩一點了。下課的時候，師母來接他。有時候，我也陪他們走上一段路。在路上，何老師通常不太說話，跟剛才上課的時候明顯不一樣，心情像變得頗為沉重似的。偶而他會發出深沉的歎息，一面走一面喃喃自語：「唉，顧老師啊！甚麼時候能見您呢？老師啊——」「老師啊！能看見我的書，那多好啊！」之後就是一大段沉默，神情無奈。他說這話是斷斷續續的，聲音很小，可是嗓音清晰，還是能夠讓身邊的人聽清楚。這種情形已經不止兩、三回，所以每回當他在路上開聲歎息的時候，我幾乎都可以料想到他要說哪幾句話，為盼望誰而歎息。雖然我不曾聽過何老師說顧頡剛怎樣影響他，可是在這短暫的十秒八秒的歎息裏，就足以讓我知道顧先生真的影響了何老師一生了。在一次閒談間，何老師提到，他大學畢業之後沒有再唸書，顧先生覺得十分可惜，常常在語言之間盼望他繼續唸研究所。後來抗戰發生，他為了做敵後工作，跑到山東當教員，掩飾身分。抗戰結束，臺灣光復，他和當時的年輕人一樣，很渴望到臺灣看看，於是帶了剛結婚不久的師母到臺灣來，從此一直留在臺灣。

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上午，由於臨時調動，我被大會安排在第二場第二位宣讀論文。在報告前，我仍然遲疑著要不要在報告時一提文中的「而」字。進場以後，我環視一下，場內很多年輕學者，也有部分是年輕學生。由於第一位講者在宣讀論文的時候，大幅度提到他的老師，所以輪到我報告的時候，就覺得毫無理由不提這個盤算了多天的「而」字，也毫無理由不提最初找到這個字的歷史意義的主人了。我介紹完之後，看到很多年輕學生眼神的陌生和惘然，最後便加了一句：「何定生是顧頡剛最喜歡的學生，他發現這個字的時候大概只有十七八歲。」當然大家聽我說這句話時才不過幾秒鐘，卻不知道我為這幾句話盤算了好幾天了。報告結束，準備離場，萬想不到的，當我正要站起來的時候，車行健教授已在背後叫住我，說要談談何老師的事。

我這篇文章就是這樣寫成的。屈指一算，何老師去世至今，前後剛好四十個年頭。何老師剛去世的時候，由於生前感動我頗深，我經常有一股衝動要寫一篇紀念

他的文章，可是往往礙於適當的發表地方和發表情景，這種衝動很快又被消磨掉。現在聽說車教授他們有意收集和有系統保存民初學者的資料，所以我很樂意答應寫出這篇懷念何老師的文章，把我當年所聽到的、所眼見的和所讀到的都記下來，供大家憑弔、懷念這位聲情並茂的《詩經》研究者。